

2020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在他84年的生命中，有着整整60年的中国共产党党龄，再加上他的奥地利共产党党龄，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了。

父亲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温馨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是独子，一直备受爷爷奶奶的呵护，无忧无虑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自幼同情弱者，常常关心有困难的同学和帮助街坊邻里。父亲的一个老同学回忆：“我爸爸患了帕金森症，每次送他去医院就诊，我上课都会迟到，理查德知道这事后，就用他的自行车推我爸爸去医院，坚持了一年多。”

父亲学医后，教授在给他的实习鉴定中专门写道：“该实习生诊治严重皮肤病患者时不介意触摸患者肢体。”战争年代里，父亲也常用他的津贴补给重伤员改善伙食，把自己的蚊帐让给伤病员使用。晚年时，他富含同情心的天性也未曾改变，始终热衷于帮助困难群众、资助山区失学儿童返校和捐赠老区希望小学。

第一次选择：来中国 寻找共产党的队伍

父亲原是一位奥地利共产党地下党员。1933年，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奥地利随之施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1934年，奥地利爆发了国内战争，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工阶级展开了与独裁政府军的武装斗争。支持社会民主党的父亲和几个童军“红小鬼”一起参加了著名的“卡尔·马克思大院”保卫战，他们负责搬运弹药和帮助医生包扎负伤的革命军战士。经过了四天的激战，革命军被无情地镇压。劳工阶级的鲜血激励了父亲，他立志要为民众的公平和正义而战斗终生。

奥地利内战后，父亲秘密加入了奥地利青年共产党组织，参加了奥共产党组织举办的战伤急救训练班。1937年，父亲从朋友那里得到

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材料，使他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革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与进步学生一起，贴广告、散发传单，鼓励民众起来反抗独裁统治。不久后，他秘密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父亲入党后，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反法西斯地下活动，后被秘密警察发现，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

1938年12月，奥地利地下党组织突然通知父亲，纳粹盖世太保下了对他的逮捕令，他必须立即撤离维也纳。危急中，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去中国，因为他上学时就听说，中国共产党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他决意要去找这支军队，去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中继续战斗，直到胜利。

第二次选择：留在中国 为民族解放继续战斗

父亲于1939年1月到达中国后，四处辗转，寻找共产党的军队。1941年，在天津参加抗日活动的父亲终于盼来了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送来的消息：晋察冀八路军司令员聂荣臻邀请他去根据地工作。这年秋末，他在北平地下党交通员的帮助和掩护下，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封锁线，到达了刚刚结束秋季大扫荡的晋察冀抗日前线。

在抗日前线，父亲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前线医生和卫生学校教员，他在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和印度医生柯棣华所在的抗日阵地上，战斗了整整三年。参加了多次残酷艰巨的反扫荡战斗和游击战，救治了大量的抗日将士，培养了许多八路军军医和卫生工作人

员，还在前线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有效地控制了边区疟疾疫情的蔓延，为减少和避免根据地的伤亡做出了贡献。

1944年1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父亲经聂荣臻亲自介绍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宿愿，并参加了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自由。当时，大多数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都先后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父亲却选择留在中国，参加解放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继续战斗。

傅莱 一位医者与中国命运交织的五次选择

奥地利 理查德·傅莱(小)



扫一扫
关联阅读全文

第三次选择：加入中国国籍 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

1949年，父亲参加平津战役后，随南下大军进驻重庆市，与全国人民一起迎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国际国内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了，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绝大部分外国人都纷纷离开了中国。父亲在这时又再一次地选择了中国，他希望继续留下来帮助新中国的建设，并加入中国国籍，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他所热爱的这块土地上一直工作生活了六十五年。

解放后，父亲主要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科研教学和行政管理的工作，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医生。每每遇到患者，他都本能

地上前关切询问；只要有人上门寻医，他都有求必应，认真检查，给出医治意见和介绍医院进行治疗，并追问医治的结果。几十年来，经他帮助救治的患者不计其数。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父亲一米九几的大个子，每月的粮食供应只有10.5公斤，根本不够他吃。我那时正值身体发育阶段，也经常吃不饱，父亲就把他在市委食堂就餐的馒头带回家来给我吃，他自己吃一些土茯苓等代食品。

父亲的身体本不是很好，他先天只有一个肾有肾功能，在这期间他常出现血尿和全身浮肿，后住进了医院。

第四次选择：回到中国 也把奶奶接来中国

三年自然灾害还未结束，又传来了我爷爷在维也纳去世的噩耗。父亲自十八、九岁离别爷爷奶奶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了，爷爷的去世给他很大打击。1962年，经中央批准，父亲在离开奥地利24年后，第一次回到故乡维也纳，探望近四分之一世纪没有见过面、又独身一人的奶奶。

有些人认为，傅莱这一走，肯定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按他们的推测，这些年来傅莱在中国经历了几次政治上的遭遇，以致工作被调动、幸福家庭已破裂，况且中国正处于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而西方世界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稳定的工作肯定会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父亲在维也纳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重返奥地利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孤独的奶奶更是要求

他能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但是，父亲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返回中国。他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在他参与创建的共和国的土地上，埋葬着许多他战争年代牺牲的亲密战友的忠骨、有着他倾注了全部青春热血的事业、他的根已经深深地植入了这片热土之中。他不仅按期回到了重庆，几年后还把奶奶也接到了中国。

父亲一生律己低调，他除了严格要求自己外，对家人也不例外。1968年，父亲出国回京，我到医科院找到他的司机老王叔，一起开车去北京站接他，结果却遭到他一顿狠狠的批评，并从此立下规矩：凡是他不在时，不允许我单独乘坐国家给他的配车。他常告诫我说：共产党人革命是为大众，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了家人。

最后的选择：在中国走完人生 将遗体捐给医科院

父亲晚年时，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也迎来了自己政治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国务院再次任命他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他还连任了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将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中国。

2004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父亲病情恶化，我们兄妹曾考虑，奥地利的医疗条件或许比中国好一些，并联系了奥地利专家，商量把他接到维也纳进行治疗。但父亲执意要在中国走完自己的人生，

还留下遗嘱，要把遗体捐给医学科学院——中国，是他做出的最后一次选择，一如65年前的第一次。

2004年11月，父亲在北京病逝，临终时身边无一子女，他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父亲身上，我看到最难得可贵的品质就是坚守：他一生坚守共产党人的信仰、坚守医生治病救人的准则、坚守为第二故乡奉献终生的意愿——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勇敢的国际主义战士、一个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



1945年，傅莱(第四排中)在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摄影：徐肖冰